

制造语文学

——评刘皓明《荷尔德林后期诗歌》*

程炜（北京大学）

20世纪以来，德语学界对荷尔德林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在刘皓明的三卷本著作《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以下简称《后期》）出版前，尽管汉语学界对这位诗人已有长达百年的相关译介，但专业性的研究基本属于空白。考虑到这部超过1600页的巨著的实质写作时间仅为2年（参见“后记”：2005年秋—2007年底），那么其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足以令学界侧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2013年又在《后期》的基础上删去了注解，精简了选文，出版了更适用于普通读者的阅读版¹，这也进一步扩大了《后期》在翻译和理念上的影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后期》出版数年来缺乏相应的学术性评论。²鉴于这部作品的重

* 感谢黄晶、刘玮、赵雪峰、葛天勤、陈冀等友人对于本文初稿的批评意见，所有的失误均由本人承担。

1 刘皓明译：《荷尔德林后期诗歌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 除了顾正祥和缪哲等人的短评，值得一提还有彼得·霍夫曼（Peter Hoffmann）书评（中译发表于2015年《新诗评论》总第19辑，第177—214页）：《“近了/且难以容纳，是那神”——刘皓明的荷尔德林后期诗歌翻译简评》（„, Nah ist / Und schwer zu fassen der Gott“: Einige Bemerkungen zu Liu Haomings Übersetzung der späten Gedichte Hölderlin,“ in *Hefte für ostasiatische Literatur*, vol. 55 (2013), pp. 97-125)。这一书评集中讨论了本书的汉德互译的策略，特别提供了对《拔摩岛》（*Patmos*）一诗不同译文的评价与鉴赏，而缺乏对本书的全面介绍以及从荷尔德林研究角度出发的评估。霍夫曼的关注点更多集中于（在其眼中）以杨炼等人为代表的当代汉语诗歌的出路，而非刘书更为看重并力图体现的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整体把握与反思。

要性，笔者不揣鄙陋，就本书的特点与局限略陈己见。下文将从三部分展开论述：首先，我将着重分析本书的长篇导言；随后，我将关注翻译和注解；最后，我将讨论全书涉及的文献、版本和体例问题。

在进行评论之前，有必要对《后期》的自我定位和目标略做概述。刘自陈不仅希望本书成为荷尔德林专业研究的出发点，而且希望能够通过荷尔德林作为中介帮助普通读者“对德意志乃至西方诗歌、神学、哲学等思想史和意识形态上这一关键的转折期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评注卷“后记”），甚至力图以本书树立翻译西方经典的语言与学术上的典范（“导言”），以此帮助汉语学界建立系统、成熟的西学研究（“后记”）。根据刘的自述，本书是他“长期以来对德意志观念论、德英浪漫派诗歌，乃至西洋古典诗歌和哲学研究的小结”，甚至全面反映了他“这些年来对诗学、哲学、神学、历史、民族、国家和政治等问题的思考”（“后记”）。换句话说，本书的自我定位并非单纯的诗歌注解与批评，而是在某种意义上融汇了诸多领域的百科全书。它不仅是了解荷尔德林诗歌的一个入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译者本人整体思想的体现。在这一背景下，读者才能领会《后期》对于《爱琴海》一诗如下的评注：

人们不妨把它（按：荷尔德林论及的父国兴衰）应用于对 20 世纪初以来美国历史的考察上。对于当下正在研究“大国崛起”规律的中国而言，也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后期》评注上，第 371 页）

值得一提的是，诗人的同时代人亚历山大·洪勃特（按：即洪堡）……于 1799 年自巴黎赴美洲探险。一百年后，统一的德国在华获得包括青岛在内的胶州地区为殖民地。德属海外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尽失。德国相对短暂的海外殖民扩张史，可以为诗人的这个残篇系统一个令人深省的注脚。（对《哥伦布》的注解，第 752 页）

《后期》长达 174 页的“导言”是把握作者上述抱负的最好入口。“导言”分为 12 节，既提供了关于荷尔德林生平、思想与文本的基本知识，也就荷尔德林诗歌的翻译、接受和阐发提出了自身的纲领。我的评论将主要从四部分入手：荷尔德林的生平与思想；作品的版本问题；相关接受史，

特别是海德格尔对其接受；荷尔德林的汉译与语文学。

（一）荷尔德林的生平与思想

《后期》的导言从法国大革命切入荷尔德林的生平，揭示了这场革命与康德思想革命对于图宾根三友黑格尔、荷尔德林、谢林的关键意义。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注意到了统一的德国当时并不存在，而符腾堡公国（Württemberg）的政治社会环境实则对于诗人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此始终谨慎地使用“德意志”，而非“德国”这一概念。³但遗憾的是，在具体的论述中，符腾堡公国的政治情境与图宾根神学院的教育体制并没有对《后期》的注解和论证发挥实质的作用，而文化和宗教上统一的德意志概念似乎反而有意或无意地成了译者关注的核心。译者在对 Vaterland 译名的讨论中，力主将 Vaterland 的核心置于宗教与教化，从而作为父国，与地母和民族（Nation）相区别。然而，荷尔德林笔下的 Vaterland 究竟是整个西方、尚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还是荷尔德林所属的符腾堡公国，或者施瓦本地区（刘译“土瓦本”），其实并不清晰。由于刘没有具体论证 Vaterland 一词在荷尔德林的诗歌与书信中的具体所指，他似乎忽视了这些文本中对于父国的多重所指：或者是理想的乌托邦，或者是具体的政治空间，或者是实际的地理故乡符腾堡。这样刘书对荷尔德林的定位似乎又回到了其所试图避免的出发点，即暗示他成为统一的德国文化民族国家理念的先行者。

更令人惊讶的是，刘从宗教和文化的父国概念出发，进一步利用历史唯物主义将荷尔德林对于基督教的关注理解（解构）为启蒙之后民族主义与基督教意识形态一种合乎逻辑的结合。他指出：

在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用理性让这些信仰和承诺失去信用和依据以后，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政治和社会的建制，其唯一根本性的存在理由就是要把“一切仇敌放在他的脚下”，换句话说，其存在的意义就

3 全书仅有一处提及“德国观念论”（评注卷，第 1 页）。但这一称呼约定俗成，谈不上失误。

在于他是政权或者说霸权 (Herrschaft) 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支柱。正是对启蒙后基督教的本质的这一深刻洞察,使得荷尔德林在 1800 年以后仿佛浪子回头一样返回基督教,把对德意志父国的希望建立在用基督教语言“神的国”来表述的意识形态之上。(评注卷,第 23 页,强调为笔者所加)

就笔者所见,荷尔德林似乎并未在诗歌与书信中明确表达这一对启蒙之后的基督教本质的唯物主义洞察,刘也并未在注解中具体考稽索隐,详细论证他的这一结论。在《拔摩岛》(Patmos)的注解中,刘甚至宣称,荷尔德林“一方面要顾及或者满足方伯⁴虔诚的敬虔派宗教感情,另一方面也不能违背他自己更为现代的世界观和宗教观。因此本诗的一个非凡之处在于,诗人勾画了一幅新的、观念论的、唯灵论的历史哲学图景……诗人在更大和属神的框架中和解了启蒙和基督教传统之间似乎无法和解的对立”(评注卷,第 674 页,强调为笔者所加)。这一评价似乎与上面引述的断言自相矛盾。

在对荷尔德林的思想语境的探寻中,刘尤其关注荷尔德林与施瓦本虔敬神学以及和德意志观念论之间的密切关系。就前一面相而言,刘对厄廷格(Oettinger)的创世神学的引介可谓纠正了汉语学界相关思想史研究的不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后期》并没有选择谨慎客观地介绍这一思潮在荷尔德林那里的可能效应,而是充满戏剧性地夸张断言,厄廷格的思想乃是理解德语古典哲学的必要前提,甚至将荷尔德林的诗学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还原为这一思想的扩展与延伸。刘总结道:“不了解以厄廷格尔为代表的士瓦本虔敬派的神学思想,我们看荷尔德林乃至黑格尔的思想和作品,就会觉得是无源之水,就不能了解 18 世纪末德意志思想史发展的隐秘的内在脉络。”(评注卷,第 60 页)这一看法与海涅和海德格尔将德国早期观念论归于新教神学的极端做法大同小异。然而对于多数早期德国观念论的研

4 荷尔德林此诗题献给洪堡(Homburg)的郡主(Landgrafen,刘译为“方伯”),即 Friedrich V。

究而言，厄廷格和施瓦本虔敬主义仅仅是理解这一思想运动发源的有益背景，而非必要条件，更绝非其隐秘起源。

关于荷尔德林与德意志观念论的关系，刘追随亨利希（Dieter Henrich）将荷尔德林视为观念论历史上促使黑格尔转型的关键人物。在简介了《德意志观念论最初纲领》（*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中的新神话和教育观念对于荷尔德林的影响之后⁵，刘讨论了康德后学弥补康德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鸿沟的努力（§1.6.1），随后集中于荷尔德林对费希特自我意识理论的批判及其思想史背景（§1.6.2-4），最后刘以荷尔德林与黑格尔的简短比较结尾。作为刘长期研究德意志观念论的成果（参见“后记”），尽管其实质内容乏善可陈，但其中部分短评和术语翻译仍值得关注：其一，作者宣称，康德的体系里，实践理性的优先性与自由学说“以他关于理性宗教的学说为基础”（第67页）。无疑刘这里颠倒了主流学界认可的康德宗教哲学与实践哲学之间的关系，但我们期待进一步的论证。其二，他将 *intellektuale Anschauung* 翻译为“知性直观”（第69页），而不是通常的“智性直观”。这一译法导致 *Verstand*（通常翻译为“知性”）的翻译成为一个问题。尤其考虑到康德哲学中不仅有 *intellektuale Anschauung*，还有 *intuitiver Verstand*（直觉的知性）⁶，如果 *Intellekt* 是知性，那么从概念上区分上述两个类似概念就更为困难。其三，作者将康德名言“*Ich mußte also*

5 刘错误地认为这一（实则由 Rosenzweig 命名的）文本名称由荷尔德林全集的编辑所拟（《后期》评注卷，第16页）；参见 Franz Rosenzweig, „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in *Sitzungsberichte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Heidelberg, 1917。当然与这一错误相比，《后期》更大的问题在于直接预设了这一文本作为三人共同思想纲领的假说，而完全没有顾及这一文本与荷尔德林关系的争议。这就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纲领》是否足以作为反映荷尔德林当时思想的可靠文献。与之相应，以之为基础重构的早期荷尔德林形象是否真的值得信赖。特别参见 Michael Franz, „Hölderlin und 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in *Hölderlin-Jahrbuch*, vol. 19-20 (1975-1977), pp. 328-357。对1989年之前围绕《纲领》的争论论述，参见 Frank-Peter Hansen, „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in *Rezeptionsgeschichte und Interpretation*, Berlin: De Gruyter, 1989。近年来这一文本的研究趋冷。

6 参见 Förster 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载于 E. Förster, *Die 25 Jahre der Philosophie: Eine systematische Rekonstruktion*, Frankfurt: Klostermann, 2012。

das Wissen aufheben, um zum Glauben Platz zu bekommen.”译为“我必须抬高知识，以得到通向信仰的位子”（强调为笔者所加），而非常见的“我必须扬弃知识，以为信仰留下位置”。aufheben在我国有一段颇长的争论和翻译史，除了目前较为通行的“扬弃”外，“否定”、“限制”和“保存”等亦作为候选项而被不同的译者使用。而钱钟书在《管锥篇》的开篇也借中国“易”的多义批评黑格尔对于 aufheben 概念独特性的执着。有趣的是，作者在《拔摩岛》的注释中写到：“荷尔德林认为：启蒙运动对固定的基督教的冲击只是一种表面上的摧毁过程，它是一种有历史必然性的过程，就像扬场一样，其实是个拣选、提纯和扬弃的过程。”（第711页）我们有理由推断作者刻意选用的“抬高”，而非俗译“扬弃”，或许暗示了其主流学界保持距离的一贯态度。但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作者认为康德通过抬高知识以到达通向信仰的位子，我们同样期待一个解释。其四，作者将荷尔德林批评费希特著名的理论残篇 *Urteil und Sein* 翻译为《原断与是》。其原因在于荷尔德林利用了 Urteil 的一个伪词源学分析 Ur-teilung（原始的区分），而指出意识的判断行为中预设了对于主体和客体的分析。尽管荷尔德林的词源学游戏实则来自费希特的影响⁷，但“原断”这一表达不仅就汉语本身而言是晦涩的，而且失去了与标题中“是”（Sein）的理论关联，因为判断的通常形式恰恰是 A ist...（A 存在）或 A ist B（A 是 B）。这种密切关联从被刘遗漏的慕尼黑版（M. Knaupp 和 M. Franz 编）来看，就更加清晰。在这一版本中，编辑不再遵循《判断与是》的传统命名，而是给出了《判断、是与模态》的新命名。这一新名称回避了稿本究竟从哪一面起源的问题，并且将对于“现实”与“潜能”的讨论（它们在传统解释中往往被忽略）给予了应当的重视。通过这三个概念，康德范畴学说的背景跃然纸上。

（二）荷尔德林作品的版本问题

荷尔德林作品的版本问题，不仅对于荷尔德林研究，甚至对于新日耳

7 可惜作者既没有指出这一思想来源，亦没有提示这一连接在语言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曼文学编辑和研究的范式转换都有着独特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尽管席勒和歌德的作品均有历史校勘版全集，但引用通行的普及本迄今仍旧得到学界的普遍承认。同样重要的莱辛，甚至今天尚无其作品历史校勘版的全集问世。与之相对，由于荷尔德林作品流传的独特性，他的大量作品没有发表也没有权威的誊写版，他也成为德语文学史上作品被最为密集编订和讨论的作者之一。迄今为止，除了大量选本与单行本，我们不仅已经拥有4种不同的历史校勘版全集⁸，而且其引用是严格限制的，例如《荷尔德林年鉴》目前主要接受最新的2套历史校勘版（StA和FHA）和2套阅读版（Studienausgabe），即KA版⁹和MA版¹⁰（考察版本史或涉及文本校勘的文章当然除外）。由于这4个版本间各有优劣，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它们均不可或缺。

斯图加特版可以视为日耳曼文学传统编订范式的极致，它不仅试图给出权威可信的正文，而且通过校勘记和详细注解，给出异读、稿本状况和交叉互文。尽管它已经试图越过古典学版本编订的准则，不设校勘栏（apparatus criticus），而是以统一的校记（Lesarten）与注解以方便读者较为直观地把握文本的生成（genesis）。然而无论是它相对封闭的编辑原则，还是通过探寻文本生成以寻得最终的理想和权威文本的设想，似乎都没有越过古典语文学编辑的界限。但不同于古代作品，对之我们仅仅拥有中世纪的抄本或者少量早期纸草，就近代与现代作者而言，我们则可能拥有手稿、誊清稿、笔记甚或经过批注的印刷本等不同性质的相关版本。而传统的校勘方法面对这些文本以及其包含信息的丰富性则显得力不从心。一方面，手稿和批注本等均构成了对所谓权威文本概念的挑战，因为作者常常也会在出版版本上进行修改，因此我们可能不是面对一个定稿，而是面对

8 除了上文提及的斯图加特版与法兰克福版，还包括早期的 Hellingrath 和 Franz Zinkernagel 两套不同的历史校勘版。Hellingrath 版不仅是当代荷尔德林研究的起点，并且极大推动了荷尔德林作为诗人的复兴。

9 Hölderlin, *Sä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3 Bde., Hrsg. v. Jochen Schmidt, Frankfurt: Dt. Klassiker-Verl., 1992-1994.

10 Hölderlin, *Sä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3 Bde., Hrsg. v. Michael Knaupp, München: Hanser, 1992-1993.

着反复涂抹的多重草稿。这样，对于理想的文本生成或谱系的构建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往往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或解读的错误而成了幻想。比如荷尔德林常常提供多种替代性表达，将其写在原初表达之后。就稿本而言，我们并不总能确认哪一个替代性表达是他最终认可的。但斯图加特版的编辑常常不得不武断地在这些平行的可能性中选出唯一的权威选项，而将其他选项视为附属的异文。另一方面，传统的校勘栏或校勘记无法体现反复修订的稿本自身的复杂形态¹¹，而后者的展现不仅直观化了作者的创作和修改过程，而且使得多元的解读成为可能。与之相对，传统封闭的编辑原则使得读者难以区分哪些因素体现了稿本的真实状况，哪些是编辑不得已或刻意为之的读法。无论如何，研究者不断感到，尽管斯图加特版以精良的校订与注释著称，但所遵循的传统编订方法不仅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而且可能导致对于荷尔德林的误解。¹²因此在法兰克福版之前，一些研究者已经尝试使用新的编辑原则编订荷尔德林的单篇作品。比如著名的研究者沃尔夫冈·宾德尔（Wolfgang Binder）在1959年就已经和阿尔弗雷德·科勒塔特（Alfred Keellettat）合作重新编订了《和平节庆》（*Friedensfeier*）（载于 *Schriften der Hölderlin-Gesellschaft*, Band 2），其中包含照片、转写等，并且试图以形态学和叙述并行的方式展示文本的生成。

20世纪70年代新的历史校勘版法兰克福版开始出版，尽管其主编扎特勒（Sattler）以荷尔德林爱好者，而非专家的身份开始了这一宏大又充满争议的工作¹³，但其编辑原则从根本上与宾德尔（Binder）等先行者无异。这

11 关于荷尔德林文本的地形学文本编辑原则，参见 Dieter Burdorf, *Hölderlin's späte Gedichtfragmente „Unendlicher Deutung voll,“* Stuttgart: Metzler, 1993; 以及 „Wege durch die Textlandschaft. Zum Stand der Edition von Hölderlin's später Lyrik,“ in *Wirkendes Wort*, vol. 54 (2004), pp. 171-190.

12 对斯图加特版比较有代表性的批评参见 Beda Allemann, „Rezension der Großen Stuttgarter Hölderlin-Ausgabe, Bde. 1, 2 und 5,“ in *Anzeiger für deutsches Altertum und deutsche Literatur*, vol. 69 (1956/57), pp. 75-91.

13 新法兰克福版出版的思想史和意识形态背景（“左派的”、“民主的”法兰克福版对阵“右派的”、“保守的”斯图加特版），可参见 Dieter Burdorf, „Edition zwischen Gesellschaftskritik und ‚Neuer Mythologie‘. Zur ‚Frankfurter Hölderlin Ausgabe‘“, in Werner Volke ed., *Hölderlin entdecken. Lesarten 1826-1993*, Tübingen, 1993, pp. 164-199.

一新版本最为核心的特征在于文本与编辑的开放性质，并且使得文本与编辑的每一步成为透明与可检验的。它一方面提供了手稿的影印件，供所有读者参照，另一方面则还原了文本本身的地质形态，尽量展现作者当时的书写状态。在诗歌的排序上，斯图加特版以编年为序，而法兰克福版则相对兼顾了稿本的内部秩序，前者展现了时间的先后，后者则顾及了空间的秩序。空间原则的意义可以通过所谓 Homburger Folioheft（洪堡册页）得到说明，这部作者写于 1802 年左右到 1807 年的手稿本（包含誊抄已发表作品、草稿和修改），因为其选文的精致和观念的一体性，成为了解荷尔德林后期诗歌的枢纽之一。因此在克瑙普（Knauppe）等人的版本中，HF 中的诗歌按照诗人本身拟定的顺序，而非以作品编年顺序分别列出，以此既体现出这些诗歌文类之间的交叉和关联（比如哀歌体与颂歌体），也体现出诗歌内容间的相互指涉（比如排印在一起的《斯图加特》、《还乡》和《饼与酒》（刘译《饼与葡萄酒》）之间对于“城”的意向的指涉）。而如果以编年排列，这种关联则变得难以察觉。由于二者不同的编辑原则，法兰克福版对于斯图加特版而言并非简单的替代和超越，而毋宁说是一种补充。不仅如此，对于日耳曼学界而言，这甚至也象征着新语文学（Neue Philologie）寻求自身学科自主性，脱离古典语文学（Klassische Philologie）的努力。在法兰克福版本之后，有一批类似的历史校勘版作品出版，例如同样来自 Stroemfeld / Roter Stern 出版社的特拉克尔作品集；而策兰则有 2 套不同的历史校勘版出版，甚至早已经开始编订的《尼采著作全集》（KGW）也在最新的一部分当中，即 1885 年之后的手稿采取了类似于法兰克福版的编订原则，以展现尼采文本的形态学。¹⁴ 在这些编辑实践之外，对于编辑原则的相关讨论也由 2 个重要的论坛所支持，其一为杂志 *Editio*（1987 年以后），

14 对尼采这一部分编订的简介，参见 Marie-Luise Haase, „Die Edition von Friedrich Nietzsches handschriftlichem Nachlaß ab Frühjahr 1885“（“德国哲学：文本与文献”会议报告，2009），中译文参见程炜译：《尼采 1885 年初之后的遗稿编订》，《现代哲学》2010 年第 3 期，第 94—98 页。也载于韩水法主编：《从文本到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补充了图片）。

另一为 *Text Kritische Beiträge* (1995 年以后), 上面有大量对于文本编订的阐释学论争和反思。

《后期》着重利用与介绍了斯图加特版与法兰克福版, 并兼顾了约亨·施密特 (Jochen Schmidt) 的 KA 版。同时, 主要依据克罗伊策 (Kreuzer) 于 2002 年主编出版的《荷尔德林手册》¹⁵, 本书从宏观特别是斯图加特版与法兰克福版的编订原则来说, 对于汉语学界缺乏版本意识的翻译和研究有着很好的提示作用。但遗憾的是, 一方面, 作者未能利用其他两个对于翻译后期诗歌非常重要的版本, 即米夏埃尔·克瑙普 (Michael Knaupp) 与米夏埃尔·弗朗茨 (Michael Franz) 主编的 MA 版和意大利的日耳曼学家路易·雷塔尼 (Luigi Reitani) 的双语对照版译注¹⁶; 另一方面刘对于后期诗歌版本的介绍往往并不准确¹⁷, 尤其未能反映出近年荷尔德林版本学的新进展 (可能多少出于对法兰克福版的迷信)。尤其可惜的是, 作者未能将其校读和翻译的经验具体地用于版本优劣的讨论, 以少量实例说明各个版本中的问题。比如作者对《独一的》这一文本进行了不同于斯图加特版和法兰克福版的独特编订, 完全可以在此处以之为例分别说明二者的问题。尽管作者警告了法兰克福版中部分合成文本的推测性, 但整体的综述仍旧给人独尊法兰克福的印象, 对于这一版本的其他缺陷、硬伤鲜有提及。法兰克福版和斯图加特版之间旷日持久的争论, 以及在两版本之外

15 Johann Kreuzer, *Hölderlin-Handbuch: Leben, Werk, Wirkung*, Stuttgart: Metzler, 2002.

16 Hölderlin, *Tutte le liriche*, Luigi Reitani ed., Milano: Mondadori, 2001.

17 比如刘称 Schmidt 版为“StA 一个普及版, Schmidt 对注释有所增删”则不尽准确。因为尽管 Schmidt 作为斯图加特版主编 Beissner 的弟子, 在文本上整体遵循师说, 但在一些作品中 (例如《恩培多克勒之死》) 则用了 Katharina Grätz 的新稿本 (Katharina Grätz 对于斯图版和法兰版的批判参见 „Der Empedokles-Text der Großen Stuttgarter Ausgabe und der Frankfurter Ausgabe. Editions-kritik und Folgerungen für die Neuedition im Deutschen Klassiker Verlag,“ in *Hölderlin Jahrbuch 1992-1993*, pp. 264-299。《恩培多克勒之死》的稿本问题, 更为详细的信息参见作者的博士论文 „Der Weg zum Lesetext. Editions-kritik und Neuedition von Friedrich Hölderlins *Der Tod des Empedokles*,“ Tübingen, 1995)。此外, 本书注释多为 Schmidt 新撰, 颇有些穿凿附会之论, 与斯图加特版的差异不小。

其他文本编辑和校勘的推进均被作者所略过（参见前文）。¹⁸ 面对部分诗歌，作者提出采取所谓调和法兰克福和斯图加特版的原则进行翻译，尽量提供可信并且可阅读的文稿，但是这里并无对折中原则内涵的具体说明，也无对之的解释学反思。这样《后期》一书尽管在理论上推崇法兰克福版，但从其诗歌分类排序的方式，校勘栏的设置，封闭的编辑原则等方面上看，其实无不体现老斯图加特版的风格。在这一点上，刘的工作就和同样身兼翻译者和编订者的意大利学者雷塔尼的工作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将荷的诗作分为两卷，其一为出版著作（351页），其二为未出版著作与草稿（928页）。未出版的草稿片段并没有按照每首诗的生成被分列出来，而是保留在稿本原初的语境中，以便揭示不少所谓对荷尔德林诗歌（特别是晚期诗歌）的重构而实际是缺乏文本基础的神话。与之相对，在兼顾编年的前提下，译者尽量提供文本的地形学样态，一方面方便读者将出版的版本与未出版的草稿相互比较，另一方面，每一首诗歌的修改、重写、边注、稿本页码等均得到了直观呈现。

（三）荷尔德林的接受，特别是海德格尔

《后期》对于荷尔德林接受的讨论整体而言充满了敌意与不安。这种态度可能一方面源于刘眼中汉语学界接受水平的低下，另一方面更由于德语世界之外，正如作者所谓，海德格尔不合时宜的过度影响。就前一点而言，他需要与缺乏专业素养却神化偶像的“自杀的文学青年”（参见作者《可怜的荷尔德林》）作战，因为此君对于荷尔德林的了解仅仅凭借“道听途说的谣传”，其写作晦涩诗人的感想却登上了权威的《荷尔德林年鉴》¹⁹；就后一点而言，刘还要与海德格尔的“中国祭司们”，或许还包括他的美

18 关于法兰克福版的争论，文献汗牛充栋，这里仅仅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献，首先包括 Sattler 收集的他本人和批评者的公开信与回复，参见 www.hoelderlin.delregister/rezensionen-korrespondenz.html, 2017-08-01。

19 Haizi, „Der Dichter, den ich liebe – Hölderlin (übers. v. Chon Ip Ng u. Peter Trawny),“ in *Hölderlin-Jahrbuch 1998-1999*, pp. 335-341.

国与法国后现代同行进行更激烈的搏斗。《后期》主要从两个方面批评海氏的解读：其一，从方法上说，由于未遵循基本的语文和校勘学原则，它对于理解荷尔德林实则无用甚至有害。其二，从精神上，海德格尔将荷尔德林的诗歌错解为巴门尼德或席勒的教诲诗，并忽视了二者文类上的根本差异。按照刘的意见，尽管海氏的解读在德语学界受到了抵制，但仍旧在汉语、法国以及北美学界有着巨大却不合适的影响。刘对于海德格尔的批评对于部分仅仅通过海氏把握荷尔德林的学人或读者而言，特别对于汉语学界，的确是一剂难得的清醒剂。因为海氏显然更关注于借助诗人阐发自身的政治与（反）形而上学主旨，而非周详地探寻与把握诗人本意。这种六经注我的态度导致其荷尔德林解读中存在大量的解释学暴力，这一点毋庸置疑。

然而，另一方面，仅仅就《后期》导论的叙述而言，海德格尔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荷尔德林阐发者之一并未得到足够严肃的对待。对于所有关心学术史，试图找到“荷尔德林与海德格尔”这一主题的研究综述的读者而言，刘的叙述无疑无法作为学术上可靠的综述使用²⁰，因为它既缺乏从思想史与学科史的语境对海德格尔解读的把握，也没有愿善意地概述其解读的特性与意旨，甚至对于海德格尔的批评也是零碎和混合着人身攻击的。《后期》对于海德格尔的批判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除了六经注我式的歪曲外一无所有，后海德格尔的德语学界一方面清算了海德格尔对于荷尔德林的歪曲，另一方面重新发现与肯定了荷尔德林与德意志观念论传统的密切联系。然而这一图景即使不是误导性的，也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它虽然承认了荷尔德林的阐释对于海德格尔本人哲学转向的重要性，却忽略了海德格尔的解读实则也应该并且可以在荷尔德林与德国思想史研究的语境下得到考察。换句话说，尽管海德格尔自称拒绝一切科学的、文学史的荷尔德林研究传统，他的荷尔德林解释也并非完全是哲

20 对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解释批判性的概述（含部分相关文献），参见 Buchheim, „Rezeption: Heidegger,“ in Kreuzer ed., *Hölderlin-Handbuch*, pp. 432-438.

学家闭门造车的玄想，而同样可以视为与当时荷尔德林研究界对话的产物。只是一方面这种关联为海德格爾的行文方式所遮蔽，另一方面又被热衷海德格爾本人学说的学者（或许为了强调海氏的独一无二性）与刘（或许为了批评海氏在学术上尚未登堂入室）忽略了。需要强调的是，在德国观念论的语境下讨论荷尔德林并非后海德格爾时代研究的新路径，它甚至在卡尔·罗森克兰茨（Karl Rosenkranz）1844年的黑格爾传记（*G. W. F. Hegels Leben*, Berlin）中就已经得到了体现，而在20世纪早期的德语学界，这一关联实则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对此狄尔泰，特别是卡西尔都有专门的论述，特别是后者的《荷尔德林与德国观念论》²¹可以算作这一观点的一时之作。从这一语境出发，海德格爾的荷尔德林阐释实则正是对这一主流阐释的反动，通过对荷尔德林诗歌独特性的挖掘，他试图将荷尔德林从黑格爾式的阐释阴影中解脱出来。²²就这一精神而言，他与后来杰出的反对者阿多诺（Adorno）以及亨利希等人实则无异。无论是阿多诺的《并置结构：论荷尔德林晚期抒情诗》（*Parataxis: Zur späten Lyrik Hölderlins*），还是亨利希的巨著《思忆》（*Andenken*），都试图通过自身的解读，颠覆研究传统中荷尔德林与黑格爾的关系，他再次肯定了荷尔德林哲学与诗的独一无二性：尤其在亨利希那里，不再是荷尔德林通过黑格爾被解读，而是黑格爾的转向实则在很大程度上由荷尔德林推动。

从行文上看，刘似乎代表德语学术界，对不能阅读德文原作的汉语和北美学界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教育。然而，海德格爾在德语学界真的已是人人批之的丧家之犬，而又在北美有着刘文体现的无可撼动的影响力么？实际上，讨论海德格爾与荷尔德林关系的论文与专著在德语学界，从来就是批判与阐发并存，不仅相关讨论没有中断过，这些年更有加强的趋

21 Ernst Cassirer, „Hölderlin und der deutsche Idealismus,“ in *Idee und Gestalt*, Berlin: Cassirer, 1924, pp. 113-155; 也参见 Wilhelm Böhm, *Hölderlin*, Halle-Saale: Niemeyer, 1928。

22 Martin Heidegger, *Hölderlins Hymne „Andenken“*, Frankfurt a. M.: Klostermann, 1982 (= Gesamtausgabe. II. Abt., Bd. 52), p. 99.

势。²³ 另一方面就英美学界而言，刘尽管并非不了解埃默里·爱德华·乔治（Emery Edward George）等学者出色的专业研究（参见“文献总目”），但仍旧强调学界对于海德格尔之外的荷尔德林缺乏认知。这一印象可能源于本书的视域更多局限在文论和比较文学界，但对哲学界的荷尔德林阐发缺乏足够关注。亨利希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在北美产生影响²⁴，他对荷尔德林的研究也于1997年被译成英文²⁵，而刘如果读过埃卡特·弗尔斯特（Eckart Förster）、弗雷德里克·拜塞尔（Frederick Beiser）以及特里·平卡德（Terry Pinkard）等人的论述²⁶，或许就不会不断强调北美学界的主流研究仅仅盲目追随海德格尔哲学，而对荷尔德林观念论哲学背景一无所知。事实上在英语学界，不仅荷尔德林在海德格尔哲学之外早已经得到了诸多讨

23 例如20世纪90年代有Ziegler的《海德格尔、荷尔德林与真》（*Heidegger, Hölderlin und die Alētheia: Martin Heideggers Geschichtsdenken in seinen Vorlesungen 1934/35 bis 1944*,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1）；Helting的《海德格尔解读荷尔德林的圣歌》（*Heideggers Auslegung von Hölderlins Dichtung des Heiligen: Ein Beitrag zur Grundlagenforschung der Daseinsanalyse*,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9）等。这个世纪以来则有Trawny与Martin-Heidegger-Gesellschaft主编的论荷尔德林与海德格尔论文集（„Voll Verdienst, doch dichterisch wohnt / Der Mensch auf dieser Erde“: *Heidegger und Hölderlin*, Frankfurt: Klostermann, 2000）以及Trawny本人所写的《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或曰欧洲之晨》（*Heidegger und Hölderlin, oder, Der europäische Morgen*,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u. Neumann, 2009），其他值得一提的尚有André的《从文本到文本的对话》（*Gespräche von Text zu Text: Celan, Heidegger, Hölderlin*, Hamburg: Meiner, 2001）和Solbach《存在的理解和神话》（*Seinsverstehen und Mythos: Untersuchungen zur Dichtung des späten Hölderlin und zu Heideggers Deutung*, Freiburg: Alber, 2008）。

24 除了他广为引用的相关论文之外，也参见Dieter Henrich, *Between Kant and Hegel: Lectures on German Idealism*, ed., David S. Pacini,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特别是pp. 216-230, pp. 279-295, pp. 299-315。

25 Dieter Henrich, *The Course of Remembrance and Other Essays on Hölderli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6 例如Eckart Förster, “To Lend Wings to Physics Once Again: Hölderlin and the ‘Oldest System-Programme of German Idealism’,” in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3 (1995), pp. 174-200; Frederick C. Beiser, *German Idealism: The Struggle against Subjectivism, 1781-180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75-406; Terry Pinkard, *German Philosophy, 1760-1860: The Legacy of Ide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31-171。

论²⁷，而且他与后康德哲学的密切关系并非什么新鲜话题。²⁸

（四）荷尔德林的汉译与语文学

在简介了汉译荷尔德林的概况之后（参见第140页）²⁹，刘集中阐释了《后期》一书遵循的汉译原则。他将用语的“陌生性”归于两个因素：其一是荷尔德林诗歌本身的陌生性，其二则来源于其试图在言语上靠近《圣经》和合本的翻译策略。³⁰在刘看来，后一翻译原则不仅仅是翻译荷尔德林，而且是整个汉语翻译应该借鉴的原则。因为他坚信，一方面，由于外国传教士的参与，和合本极大地避免了基于文化和语言导致的翻译错误；另一方面，由于晚清读书人的合作，保证了其使用本土自身的语言，而非之后欧化的、受到日文影响的新白话。这一对于和合本的推崇与冯象的拒斥形成了鲜明对照。

与和合本典范的语言相对，刘特别批评了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诗歌，将他们的诗歌观念称为“生物性的诗歌观”（第162页），宣称“他们对自由的错误观念导致他们以为诗歌的优劣是与其荷尔蒙含量成正比的；他们的反历史主义的观点使他们几乎完全不具备解释学的意识”（第159—160页）。从这一翻译策略出发，刘将所有专名，只要有和合本典故的，多采取了和合本的译法，而非目标语言的发音，比如 Immanuel Kant

27 比如 Maurice Benn, *Hölderlin and Pindar*, Hague: Mouton, 1962; Robin Harrison, *Hölderlin and Greek Literatu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Eric L. Santner, *Friedrich Hölderlin: Narrative Vigilance and the Poetic Imaginatio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6; Mark Ogden, *The Problem of Christ in the Work of Friedrich Hölderlin*,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91.

28 其他比较重要的著作包括 Manfred Frank 的巨著 *Unendliche Annäherung* 的英文节译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 trans., Elizabeth Millán-Zaiber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特别是 lectures 4-6.

29 这一概述中遗漏了先刚的译本《塔楼之诗》（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作者没有评论顾正祥的译本，而对戴晖译本，作者自引了写给《南方周末》的书评《可怜的荷尔德林》。这一书评对于戴女士的《荷尔德林文集》显然过于苛刻了。

30 在2013年出版的《荷尔德林晚期诗歌集》导言部分，刘重申并且再次论述了这一翻译原则。

不再是我们熟悉的伊曼努尔·康德，而是以马内利·康德；Benjamin 不再是本雅明，而是便雅悯；Artemis 不是阿特弥斯而是亚底米。不仅如此，《后期》所引的柏拉图部分也近似于和合本中《创世纪》的文风，比如《蒂迈欧》37c-d（刘本写为 37d）：“现在生了宇宙的父看到它开始运行了，活了，成了一个永生的诸神的神龛，便欢喜了……”然而刘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策略与本书在别处追求译音准确，而不惜修改通译的行为间实则存在张力（详后）。

在具体的译文中，作者选择了尽量贴近字面的转换，甚至尽量少地调整语序。如果说德语的格位变换保证了基本语意的清晰，汉语的非屈折语特征则使得刘译本的语言常常非常陌生，间或含糊甚至具有误导性。刘似乎意识到这一问题，在导论中，他以一些具体诗段讲授了朗读《后期》译文的技巧，并且试图以此来克服译文本身的佶屈聱牙。通过标注重音与断句，刘指出，如果读者以模仿音乐的方式歌唱这些译文，那么其语言上的陌生性就不再成为问题。例如面对“一个征兆我们是”（Ein Zeichen sind wir）这样的翻译，他教导读者，只要以正常语气朗诵“一个”，以 1/4 拍的速度朗读“征兆”，以 1/16 的速度朗诵“我们是”，这个翻译不仅可以传达原文的力量和急迫，而且不会影响理解和阅读（第 541 页以下）。然而，《后期》一书不可能也事实上并没有给予所有的诗文同样详细的说明，并且通过节奏的变换能否克服汉语和德语句法上的差异实则相当可疑。例如当《后期》将《思忆》中的“Hinschaut ein edel Paar / Von Eichen und Silberpappeln”（直译为“一对高贵的橡树与白杨远眺”）译为“远眺着一对儿高贵的橡树与白杨”时，读者很可能将橡树与白杨理解为宾语，而非原文的主语。此时，无论如何变化朗读的节奏似乎都无济于事。

《后期》到导言最后以“语文学和日耳曼学”作为总结，再次强调了语文学在其研究中的奠基性作用。事实上，《后期》导读的最后一节“方法论：语文学方法和日耳曼学”基本上是《从好言到好志》一文的改写，但海德格尔作为语文学和哲学结合典范的事例被删去了（可能为了与前文对

海德格物的批判相一致)。³¹刘指出:“好言和好智(按:即语文学和哲学)是西方人文传统互为作用、互为前提的两极……从好言到好智之间的跨度涵盖了西方人文传统的核心甚至全部。”(第164页)为了强调这一互动关系,他引用了小施莱格物的话:“语文学……是哲学的一部分,甚至不如说,是一种哲学。”(引文略有改动)有趣的是,在之前批评海德格物的文字里,刘同样引用了施莱格物的话:“当哲学家把哲学应用到语文学和历史学上时,其结果永远只是哲学,而不是语文学或历史学。”(第138页)就前一引用中,刘似乎想说明语文学与哲学的联系是根本的和积极的;而在后一引文中,刘说二者的联系是消极与非合法的,至少哲学不应当运用到语文学上,其运用是以哲学损害语文学为代价的,正如海德格物蹩脚的荷尔德林解释。我并不确定施莱格物在后一个意义上理解第138页的引文,但探讨施莱格物的本义尚不是我们的主题。即使刘的理解是正确,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语文学与哲学并非互为前提,互相作用。这样,刘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或许刘仅仅认可的是语文学作为哲学的前提,即从语文学到哲学的运动,而非双向运动。如果是这样,从哲学史上看,这一命题仅仅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它根本无法如刘所言涵盖西方哲学传统的核心,更不用说整个西方人文传统。确然有一些哲学家的哲学与语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尼采、伽达默尔等人,然而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黑格物,或者当代主流的分析哲学,它们与语文学并没有直接(如果不是相反的)关系。哲学有其自身内部的前提与理路,它在有限的意义上可能受惠于语文学,但不必以语文学为前提。

作者对语文学戏剧性的神化在导论的结尾处达到顶峰。他宣布:语文学“不仅为哲学奠定了基础,预备了其必要条件,也是所有本质上属于历

31 在谈论德国古典学的历史主义背景时,刘同样正面引述了海德格物:“对于历史主义者来说, *Historie* 并不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只有 *Geschichte* 才属于具有目的论意义的人类(也就是西方的人类)普遍历史。”参见海德格物:《阿纳克西曼德箴言》(*Der Spruch des Anaximander*),载《林中路》(*Holzweg*,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94),第337页。(参见刘皓明:《从夕土到旦邦》,《读书》2004年第9期,第49—55页)

史的研究的基础，也就是说，是所有人文学科或灵的科学的基础。本书所采用和所体现的方法，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语文学基础上的阐释学的方法。通过对荷尔德林后期作品的语文学研究，我们旨在抵达更高的哲学、神学和诗学问题，不仅用语文学为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提供翔实的解释，而且也通过它表达我们在诗学、文学、哲学乃至宗教和神学等方面的观点和关怀”（第172页）。我猜，如同当代哲学家都不敢对哲学有如此高的期望，通常更谦卑的语文学家也无勇气表达这样的梦想。

二

下面我们来谈论诗歌的翻译和译注部分。作者的翻译收录在文本卷，并且附有德文原文供有德语阅读能力的读者阅读。在译注卷中，作者将荷尔德林的后期诗歌分作3类，每一大类下首先给予导论性质的体说，随后是每一诗歌的译注。具体的译注分为勘读记、注疏和总释三部分。勘读记中，作者简介稿本来源、异文等，并且为其选择加以说明，注疏包含题解和对于具体段落的典故、互文等的说明，而总释通常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分阙介绍全诗意旨。附于每一诗类前的“体说”，不仅对中国读者了解荷尔德林的诗歌，而且对理解一般西方诗歌，都有着一定帮助。因为尽管汉语学界引进了不少诗歌批评的论著，但对西文诗歌的基本格律以及历史沿革了解并不算多。刘的讨论除了论述荷尔德林，还提供了大量关于诗体的知识，试图为不谙西文的诗歌爱好者提供入门读物参考。³²

32 不过，这部分内容并不乏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刘论证 Lyrik 应该翻译为竖琴诗，而非一般的抒情诗。尽管这一翻译似乎巧妙地利用了传统译法中“抒情”与“竖琴”的谐音，但新译名带来了更多的学理问题。因为首先，希腊的 λύρα 不是今日所见的竖琴，而是抱琴，以 Lyrik 为竖琴诗会引发误导性的联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 Lyrik 翻译为抱琴诗就是合适的。因为尽管 lyrikos 之名是我们对于希腊早期一种诗歌类型的称呼，但乃至经典时期，现代被称为抒情诗人的团体似乎并没有得到希腊人自身的承认。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论诗的著作中我们几乎看不到相关的讨论。从漫步学派似乎才开始对于个别抒情诗人的研究，而在亚历山大语文学编订的目录中，开始了类似于现代的归类工作。Lyrik 一名实则起源于希腊化时期（λυρικά, Philodemus, de

《后期》中的诗歌翻译，如上文已经提示的，具有“晦涩”和“陌生”的特征。这一方面是荷尔德林晚期独特诗风所致，另一方面也在于刘在句法上追求对德文语序的保持，而专名上往往舍弃通译而另有所发明。除去上文提及的倒装句可能导致的语意偏差，一些长句也会造成理解的困难，比如《面包与酒》的译文“一位半神几不能道出 / 那些以恩赐就他们的姓名甚谁”（文本卷，第59页，原文为“kaum weiß zu sagen ein Halbgott, / Wer mit Nahmen sie sind, die mit den Gaaben ihm nahn”）。与之相对，笔者更倾向于翻译为“几乎半神也不能说出 / 谁是这携礼且施惠而近者”。有趣的是，与大量长句、难句以及文言化的表达相对，刘译似乎对于荷尔德林诗中较为单纯的表达反而用心不足，从而间或有过于俚俗化的倾向，比如同一首诗中的部分表达：“上天的对此能忍便忍”（Möglichst dulden die Himmlischen diß，第59页），“奇事般而丝毫不爽”（aber so vieles geschieht，第65页）。

《后期》译文中陌生的专名部分来自于和合本的习惯，部分来自刘本人对于相关词汇的理解或者音读。刘特别区分了德语字母s发音中的“施”和“斯”³³，并反对希腊专名的转读包含第一格的辅音词尾。尽管译者追求复原所谓准确的音读，但有时这些原则并没有贯彻一致³⁴，有时他似乎也受到英文的影响³⁵，因此这些修订或许并没有刘设想得那样彻底。但更为严重的

（接上页）*Poematis* 2,35，此处与悲喜剧相区别），后来一般用其标示与戏剧和史诗不同的诗歌形式。换句话说，它尽管字面指向以lyra伴奏的诗，也是实际包含以αὐλός（希腊的一种管乐，一般翻译为笛，但与今天的笛并不相同）伴奏的诗（比如哀歌体），也包含以lyra和aulos共同伴奏的诗，甚至可能是无音乐的诗，比如Iambos（这点有争议）。并且既然荷尔德林本人似乎并没有在狭义的意义上限制Lyrik的用法，我们也没有必要将其翻译为抱琴诗。

33 尽管《后期》准确地指出，在德文中St中的s应该为“施”而非“斯”（比较“施图加特”与俗译“斯图加特”，类似的，“维特根施坦”比“维特根斯坦”准确），但刘似乎不知道德文的ß，即双s，应该发音为[s]，而非[f]。因此著名的荷尔德林研究者Beißner当译为白恩纳，而非刘选择的白土纳。

34 比如在第434页中提及Elysium，即希腊文的Ἠλύσιον，按照刘自己的原则，那么应该读为厄吕修，而非刘的厄吕西翁。

35 俗称温泉关的Thermopylai被翻译为瑟尔摩匹莱，这一读法似乎受到英文的影响，因为θ实则为t加呼气h，发音类似于[tə]，而非英文的“斯”或“瑟”。

或许是，相对于通行译法，刘的一些译名并不悦耳，这严重削弱了《后期》译文对于音乐性的追求。让读者最感不适的或许是 Dionysos 和 Diotima 这两个译名，因为刘将前者翻译为“丢尼索”，后者翻译为“丢提玛”。然而，首先，“丢”这个字无论是在音色还是意义上的联想均是让人不快的，这似乎不适合 Dionysos 和 Diotima 这两个形象。其次，希腊文中 dio- 是 2 个音节 di 和 o，并不能视为 1 个音节。特别是 Dionysos (Δῖόνυσος)，重读在 o 上，因此需要通过音调的转换得到强调。此外在古风时期它还有另一种常见写法 Δῖόνυσος³⁶，这里是长音的 o，更说明了无论如何不能将 dio 这 2 个音节合并成一个音节“丢”。

相对于可能见仁见智的译文评价³⁷，让我们将更多的精力用来考察本书的学术性注解。我将首先利用一个个案来讨论全书注释的特点，随后从整体给出一些评论。这里，我选择了荷尔德林晚期诗歌中的名作 *Andenken*，刘翻译为《纪念》（林克翻译为《追忆》，我倾向于翻译为《思忆》）。

按照本书的体例，刘首先简要勾勒了本诗的成诗背景。《后期》虽然提及了 1802 年荷尔德林辞去家教职位后的波尔多之旅，也在总释里涉及苏瑟特·格塔 (Susette Gontard) (诗人诗中 Diotima 的原型)，可惜未能说明她在荷尔德林出发前的重病，以及她于 6 月去世的背景（荷尔德林回到斯图加特后得到消息）。因为这一事件极可能是解读此诗的重要线索之一。在随后的校勘记中，刘除了简述斯图加特版对 Homburg H 27r 以及 1808 年发表稿的处理情况，还指出扎特勒认为，《最先来的》³⁸ (Das Nächste Beste，以下简称这一文本为 DNB) 第一稿的文本也是本诗的初稿片段。对于熟悉荷尔德林的读者而言，《后期》的这个信息或许让人困惑。因为 DNB 第一稿仅有最后两句关于东北风的意象与《纪念》一诗有所交叉（即“Und

36 《伊利亚特》6.132, 14.325, 《奥德赛》24.74; 赫西俄德:《神谱》947; 阿基洛库斯 (Archilochus) 77; 特奥格尼斯 (Theognis) 976, 参见 LSJ (《希英大词典》)。

37 对本书译文一个更为积极但并不全面的评论，参见彼得·霍夫曼书评 (详见注释 1)。

38 尽管我对于刘的标题译名持保留意见，但详论这一主题需要太多篇幅，而且此并非我们的主题。

ihnen machet waker / Scharfwehend die Augen der Nordost, fliegen sie auf"), 但文句和措辞迥异。无论这两句诗, 还是全诗均难以作为《纪念》一诗的初稿。而如果我们翻看扎特勒的评注原文 (FHA 8. 804), 会发现他同样认为此诗的初稿当为 $\Sigma 73.1-4$, 即上文提及的 Homburg H 27r, 而未提及所谓 DNB 第一稿。那么这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当我们考察扎特勒为 $\Sigma 73.1-4$ 撰写的简介时, 我们才发现刘或许误读了此处的注释。扎特勒在此处指出, 遗失的初稿 (因为 $\Sigma 73.1-4$ 仅仅包含全诗第 49—59 行) 可能已经接受了草稿 $\Sigma 64$ 《良辰尚多》中关于东北风的动机 (...übernehmen vmtl schon das Nordost-motive des grundentwurfs $\Sigma 64$ <Viel thuet die gute Stunde>, FHA 8.716)。这里所谓的 $\Sigma 64$ 《良辰尚多》即 DNB 第一稿, 文中的 grundentwurfs (初稿) 并不是指向《纪念》。同时, 我们也不能因为两首诗具有相同的动机 (Motive) 就将创作时间早的一首作为另一首的初稿, 何况在斯图加特版的注释中实际已经发现了两首诗涉及东北风动机的类似之处 (参见 StA 2.2. 802)。因此扎特勒并没有像刘转述的那样认为 DNB 第一稿是《纪念》的“初稿片段”。

从这首诗具体的“勘读记”来看, 法兰克福版对于荷尔德林原始行文状态的复原并没有对刘的校读起实质作用, 比如通过斯图加特版我们可以知道第 50 行的 die Männer gegangen, 在草稿 $\Sigma 73.1$ 中为 die Männer gezogen, 但只有通过法兰克福版我们才知道, 荷尔德林的 $\Sigma 73.1$ 中最初的写法是 Die Freunde gezogen。这一类的异文, 刘没有做任何记载, 相反刘的校读记仅仅是大斯图加特版校读记的缩编 (参见 StA 2.2. 801)。但是为何刘仅仅选取了第 51、56 和 59 行的异文, 而没有翻译斯图加特版其他行列举的异文? 他似乎并没有说明相关的标准。除了上述细节外, 《后期》一书设立以中文表述的校勘记这一形式本身或许值得商榷。我们知道, 校勘记主要的作用是提供原文的异文和文本生成信息。但由于《后期》的校记仅提供汉语译文, 而没有附上相应的德文, 这对于想了解异文准确信息的读者而言实际是无用的, 因为我们无法还原这些译文的原文。

《纪念》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本书的注疏似乎主要利用和缩编了大斯图加特版的注释以及乌尔里希·盖尔（Ulrich Gaier）的名作 „Hölderlins vaterländischer Gesang, Andenken“³⁹。因为前者提供了绝大部分文本的交叉指引和历史背景，而后者特别挖掘了本诗与品达的密切关系。⁴⁰ 尽管有上述权威注释作为参考，但刘注的具体行文，特别是引证，包含不少转录错误。比如注释行 1，刘文指向 DNB 第二、三稿行 31（东北风尖利地吹着），实则应该为行 32，并且第一稿中亦有此句。刘恰恰在校勘记中误以为扎特勒认为此句为《纪念》的初稿片段，但在这里却遗忘了这一句。行 13 注释（Noch denkt das mir wohl），关于施瓦本方言入诗的问题，作者引证的《独一的》行 44 应该为行 45。注释行 16，关于无花果树，作者引证《记忆女神》（*Mnemosyne*）行 52—53，实际此诗仅第一稿有 52 行，其他两稿均于第 51 行就结束了，出现无花果的当为不同稿本的行 35 或 36。同样，追随大斯图加特版的注释，刘指出荷尔德林在翻译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狂女》（*Bacchae*）时，将 σῆκόν（圣所）与 σῦκον（无花果）混淆，这里应该是这一悲剧的行 11，而不是行 10。注释行 19 关于 auf seidnen Boden（锦缎的地面），刘注提及《通往相见的道路》草稿，但未给出具体出处，根据大斯图加特版的注解，当为 StA 2.2. 581 行 15 和 33 以及同书 844 行 32，“锦缎的地面”出现在异文中。而刘文将异文合并入原文一同翻出，这一做法可能受到盖尔（Gaier）论文的影响。注释行 26，关于暗红的葡萄酒，刘引证《致兰道尔》行 19—20 有误，应该为行 22：“Wie dunkler Wein, erfreut auch ernster Sang.” 在行 33 的注释中，刘误解了大斯图加特版的注释：“in der Pindar-Übersetzung steht das Wort für ὄραος (Pyth 1, 184; 4, 244); siehe auch Oed. Tyr. v. 1456 (1437): Wo ich mit Menschen ins Gespräch nicht komme.” 他读为“乃至对品达《匹》1.184 和 4.244 以及索福克勒《俄底普王》行 1456 中 ὄραος 的翻译”（第 877 页）。事实上，斯图加特本的意思是请读者首先

39 载于 *Hölderlin-Jahrbuch*, vol. 26 (1988-1989), pp. 175-199.

40 比如行 4 的注释引品达《匹》1: 33-34，应该取自 Gaier, p. 177.

参照荷尔德林对于品达《皮托凯歌》(即刘引文中的缩写《匹》) 1.184 和 4.244 中 ὄραρος 一词的翻译, 其次再参照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行 1456 (1437) 的诗文: θνητῶν φανοῦμαι μηδενὸς προσήγορος (荷尔德林的译文: “Wo ich mit Menschen ins Gespräch nicht komme.” 即我不与有朽者交谈)。显然, 这一行中根本就没有 ὄραρος 这个词。此外, 斯图加特版的标注 1456 指荷尔德林所用版本的行数, 而括号中的 1437 指我们现在版本的行数。按照刘总目目录中所用索福克勒斯的希腊文本, 是不可能给出 1456 这一引用的。⁴¹

笔者此处不再具体分析每一首诗歌的翻译与注释, 仅希望通过上文的个案分析使得读者把握本书注释的一些特点。接下来, 笔者将集中在注本中希腊文化相关的知识(这同时也是理解荷尔德林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对全书注疏的特征进行一些概括性的批评。当然从原则上看, 一个理想的注释应该首先说明荷尔德林本人和他同时代某一希腊意象的理解。其次, 在必要的时候, 其也需要包含我们当代对于同一问题或概念的相关理解。二者的结合一方面帮助我们明确荷尔德林文本的时代特征, 另一方面准确把握学界新近研究的推进。遗憾的是, 从前一角度看, 作者并没有充分利用荷尔德林同代的神话学词典, 比如黑德里希(Hederich)的《详尽神话学词典》(*Gründliches mythologisches Lexikon*, 1770年版, 1996年有WBG重印版)和同时代人的相关史料⁴²; 就后者而言, 《后期》间或给予我们的是过时的、错误的、不融贯的或不相关的信息。比如在《饼与葡萄酒》的注解中, 刘将对狄奥尼索斯(“丢尼索”)的理解建立在瓦尔特·奥托(Walter Otto)

41 除了上述失误, 本书也有一些应该出注的段落或者重要的典故未能给出。例如, 全书最后的名句“Was bleibt aber, stiften die Dichter”典出Ovid, *Amores* 3.9.29: *durant, vatis opus*。

42 也例如, 刘注比较敏锐地说明了Indier在这首诗中的歧义性, 即一方面指向美洲的印第安人, 另一方面又指向印度(参见本行注释), 但本书没有给出相关的文献材料以加强自己的论断, 而相反Jochen Schmidt此处的注释则给出了赫尔德的《人性历史哲学的理念》(*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II 10.6)和小施莱格勒《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的用法说明Indier一语的歧义性, 这可以巩固刘的论点。

的研究之上。虽然奥托 (Otto) 的狄奥尼索斯解读独树一帜, 但是也由于其浪漫化和非学术化的倾向, 颇为让人诟病。更重要的是, 狄奥尼索斯的研究在 20 世纪后半叶有重要突破, 比如在线性文字 B 中发现狄奥尼索斯的名字, 这就基本否定了传统上认为他是外来神的旧说。但本书仍旧坚持狄奥尼索斯最早见于小亚细亚的吕底亚, 因此主张这位神及其崇拜起源于小亚细亚 (第 255 页), 但是这已经是过时的看法。⁴³

《后期》中还有一些错误的信息, 比如它告诉我们: 阿波罗为杀死皮托 (Python) 赎罪, 从而给阿德梅托斯 (Ademetos) 当奴仆, 参见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阿尔刻提斯》(Alkestis) (第 378 页)。然而这个注解混淆了阿波罗为杀死独目巨人 (Kyklopen) 而被宙斯惩罚, 为 Ademetos 服役一年和阿波罗杀死皮托这两个故事。再比如, 刘称撒提尔 (Satyr) 为半人半羊的神话形象 (第 611 页)。这可能受到汉语学界常年将其译为羊人, 或者将撒提尔剧称为羊人剧的影响。事实上, 撒提尔在希腊化时期之前是马人, 而非羊人。半人半羊的影响属于晚出, 这一点只要留意一下相关的瓶画材料就可以发现。

刘著中还有一些不融贯的解读, 比如在介绍得墨忒耳 (Demeter) 时, 刘指出 Demeter 的名字源自 Γη-μήτηρ, 实则为穀神 (第 465 页)。这里提供的 Demeter 的词源学解释和其所代表的身份不一致。因为如果将 Demeter 读为 Γη (大地) -μήτηρ (母亲), 那么相应的解释应该为地母, 而非穀神。在将 Demeter 解读为地母的传统中, 除了 Γη (大地) -μήτηρ (母亲) 这一分析外, 还有 δημομήτηρ (demos 意为地域) 或 Δω-μήτηρ (Δω 为 χθών 的缩略形式, 意为地或地下)。而如果将 Demeter 理解为穀神, 刘应该诉诸的证据不是 Γη (大地), 而是将开头的 De- 理解为克里特语的 δηαί, 相当于

43 与这一问题相连, 刘认为 Dionysos 的本名是 Bakchos (第 256 页), 这一观点也有待商榷, 这似乎预设了 Bakchos 是一更为原初的名称。但至少如之前所言, 在线性文字 B 中已经发现 Dionysos 的名称, 而 Bakchos 相反似乎为晚出。因此学界一般说 Dionysos 的别名是 Bakchos, 而非本名。

κριθαί, 即大麦的意思(如 Nilsson 是这一解读的支持者)。⁴⁴

最后再举一个不相关的解读, 在解释《独一的》文本二时(第 647 页), 刘引入 to tode ti 来解释荷尔德林所言及的“某个”(etwas), 且不论这两个词汇并不对等(to tode ti 有时翻译为 einer etwas, to tode ti 则为 das einer etwas, 均是亚里士多德的术语, 而非日常语言; 即使二者相同), 无论从历史角度(荷尔德林这里并没有对亚里士多德的指涉), 还是从理论角度引证(to tode ti 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荷尔德林的 etwas) 亚里士多德都没有意义(如果不是增加混乱)。⁴⁵

三

讨论完《后期》的主体部分(导言、翻译和注释), 最后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其书的宏观特征。刘在研究中多次强调了《后期》一书的语文学方法、特性与目的, 并宣称其研究建立在“所能看到的迄今为止出版的几乎所有荷尔德林批评成就之上”(“后记”, 笔者的强调)。无疑, 针对汉语日耳曼学界落后的研究现状, 《后期》一书在学术规范和文献完备上, 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另一方面, 作者在体例和文献选择等方面也并非没有局限。

首先, 就学术体例而言, 无论对康德、施莱格尔和尼采等人⁴⁶, 还是对

44 Burkert 在《古风与经典时期的希腊宗教》(*Griechische Religion der archaischen und klassischen Epoche*, Stuttgart: Kohlhammer, 1977, p. 245) 指出这一解读的困难在于希腊普遍用词是 ζέα 或 ζειά, 而非词典中的 δηαί。因此目前对于 Demeter 的词源学解释尚没有完全满意的答案。

45 其所引的《形而上学》1029a28 应当为 1029a27-28, 而引用 τὰ καθ' ἑκάστων 时提示参见《形而上学》1027a27, 而笔者在 a27 却并没有找到这一表达(作者可能把 1028a27 错写为 1027a27)。

46 本书对大量有标准缩写的全集作品, 常常以 Werke (著作集) 通称引用, 而非使用例如 FSKA (《小施莱格尔历史校勘版全集》) 与 KSA (《尼采校勘研究版全集》) 这样的通行简写。而对具体作家的引用, 比如康德, 也没有采取《纯批》使用 A 和 / 或 B 版(刘时而引为 B 版加 Meiner 版), 其他作品采用科学院页码的习惯(刘引为 Meiner 版)。刘称“达姆施塔特黑格尔全集”的编写仍在进行中(第 985 页), 然而第 971 页引用的《黑格尔全集》分明是汉堡的 Meiner 版(事实上, 最新的黑格尔全集仅是汉堡版, 达姆施塔特版的新黑格尔全集完全是子虚乌有, 后者仅仅翻印过一些依据汉堡版的选本)。

大量希腊罗马的古代作家，本书的引用未能遵循较为统一的标准，并且包含不少信息上的错误。⁴⁷

其次，在专名的转写方面，《后期》的行文同样散乱（不考虑引用文献标题或诗文原文）。刘似乎时而跟随英美学界（如 Aristotle，在德语学界或原文转写中均为 Aristoteles，或第 922 页上将 Kirke 写为 Circe），时而遵循德语区的拼写习惯（比如写 Orest，而非转写的 Orestēs，第 811 页），间或却也采用希腊文的直接转写（如 Theokritos）。⁴⁸

此外，《后期》研究文献的选择值得商榷。这也是造成部分注解陈旧或不完善的原因。比如就荷尔德林早期生平与思想而言，在刘的描述中，黑暗的图宾根神学院中光环笼罩三友的旧传记模式仍旧清晰可见。如果作者参考一下亨利希（Dieter Henrich）的《自我的奠基》与米夏埃尔·弗朗茨（Michael Franz）主编的三卷《荷尔德林、黑格尔与谢林的教育背景史料》⁴⁹，或许可以回避这一常识的陷阱。而除了新进文献失收之外，本书注解中提及的文献有部分在最后的文献总目中失收。⁵⁰更让人忧虑的是，与遗漏的文献相对，《后期》收录了一些与主题无关或非学术性的文献，可谓画蛇

47 比如《前苏残篇》最好引为 DK 或 VS，并且应该引编码，而非页码（参见《后期》第 278 页）。亚里士多德《诗学》应该引卡塞尔（Kassel）在牛津 OCT 系列的校本，而非 Butcher 的《亚里士多德关于诗与艺术的理论》（*Aristotle's Theory of Poetry and Fine Art*）。此外刘书所附的参考文献总录也有少量瑕疵：比如荷马选译文质量堪忧的陈中梅译本（既然作者在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那里均表达了对于翻译问题的不满）。刘称引用柏拉图为“Thrasyllos 码”（第 974 页），实则应为 Stephanus 码。

48 英语常写为 Theocritus，德文则为 Theokrit。此外，转写中存在一些错误和不一致，比如应该是 Polydeukēs，而非 Polydeuke（第 808 页）；“会饮” συμπόσιον 在第 564 页和第 543 页误写作 sumbosition，而在第 706 页 symposion 是正确的；而 ἐπιστήμη 的拉丁化转写有长音符（第 924 页），时而则无（第 927 页）。

49 Dieter Henrich, *Grundlegung aus dem Ich. Untersuchungen zur Vorgeschichte des Idealismus. Tübingen-Jena 1790-1794*, Frankfurt: Suhrkamp, 2004; Michael Franz ed., *Materialien zum bildungsgeschichtlichen Hintergrund von Hölderlin, Hegel und Schelling*, Eggingen: Isele, 2004-2007.

50 评注卷上第 76 页列举的 Henrich 1967 和 Frank 2003 都不见于总目，笔者猜测前者应该为《荷尔德林论判断与存在》（*Hölderlin über Urteil und Sein*）；而上文提及的后一文献则可能是 Manfred Frank 的《荷尔德林论神话》（*Hölderlin über den Mythos*）。

添足。⁵¹

值得称赞的是本书文本卷有两种索引，即“专有名称索引”与“标题与首行编目”。评注卷附有附录、年谱、文献目录、名词概念索引与后记。尽管这一周详的结构或许为汉语学界的翻译工作树立了形式上的榜样，但遗憾的是全书不含引用著作索引，并且专名索引仅限于诗歌本文，因此若想获知注解与导言中的信息仍旧困难重重。

最后，全书也包含一些行文或印刷上的错误，有必要进行更为仔细的校对。比如第350页引证《斐德若》229a，实际应该为229a-b。而在第352页，柏拉图的对话录 *Politeia* 被错误地拼写为 *Politeias*；此外，这一词语也不是刘所谓的城邦（*polis*），而是城邦的体制或总体结构，应该译为《政制》。第409页德文的冠词 *die* 应该小写。第537页刘称卢梭的《忏悔录》为周士良中译本（商务印书馆），这里实则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卢梭的同名作品有商务印书馆李平沅本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黎星与范希衡版等。

尽管存在解释与文本上的部分瑕疵，但笔者的批评并不意在否定《后期》一书的价值。恰恰相反，《后期》是汉语学界荷尔德林研究的开山之作，在此书中一些诗歌首次得到翻译，西人百年来的荷尔德林研究与注解也得到了部分译介，因此这部作品对于汉语读者的重要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刘在总结性地评价自身注疏时也强调说：

51 比如作者本人通过德里达谈《斐德若》（*Phaedrus*）的随笔《服食德里达——柏拉图笔记之一》。由于这篇文章似乎既与柏拉图没有关系，又与荷尔德林的柏拉图以及荷尔德林没有关系，我们很难看到收录它的意义。再比如，本书在《爱琴海》一诗行171的注解里（《后期》评注上，第350页以下）提示了“*Ilissos*的梧桐”出自柏拉图的《斐德若》。这一提示显然是必要而合宜的，既然诗人在文本而且在书信中都涉及这一形象（刘注此处未给出应该明确的书信出处）。但作者随即联想到德里达对于这篇对话的解读（解构）《柏拉图的药》以及自己对德里达（或柏拉图）的研究（即上文），后2个信息对于理解荷尔德林无疑是多余的。如果作者想增加这一注解的实质意义，或许可以推荐 Elliger 的 *Die Darstellung der Landschaft in der griechischen Dichtung*, Berlin: De Gruyter, 1975, 其中第288—298页专述了柏拉图的《斐德若》中风景描述的含义。另外也可推荐 Görgemanns, „Zur Deutung der Szene am Ilissos in Platons Phaidros,“ in G. Most, H. Petersmann & A. M. Ritter eds., *Philanthropia kai Eusebeia. Festschrift für Albrecht Dihle zum 70. Geburtstag*,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3, pp. 122-147。

除了在文本勘读方面有所发明外，在纯粹的历史语文学研究方面，我个人的贡献较多较集中的地方，除了所有涉及汉语语境与资源的那些方面之外，主要在于对诗人作品与莱辛、厄廷格尔、雅各比、赫尔德、克洛普施托克、席勒、黑格尔、谢林、施莱耶尔马赫和弗·施莱格尔等同代作家作品之间呼应的识别和阐发，其次也在于彰显、发明和诠释那些为批评家们忽略的圣经和希腊古典指涉。（“后记”）

略微遗憾的是，或许是出于东方人的沉潜，刘决定将“自己的见解，无论是辨认具体的典故出处，还是更一般的解读，一般均融入全书各部分中，并不一一标明”（“后记”）。与作者的谦虚相反，笔者数年前曾偶遇一位以品达为研究重点的匈牙利青年古典学者，他在荷尔德林诗中仅仅发现了3处为赛费特（Seifert）等传统批评家所忽视的品达指涉，便随后撰文发表在权威的古典学刊物 *Gymnasium* 之上。既然如刘所言，《后期》在文字校勘、同代与古代文献指涉上均有大量发明，那么这些发现无疑值得形成多篇英文或德文论文在国际日耳曼学或古典文学研究刊物中发表。比起《后期》这部面向汉语学界的巨著，笔者相信，这些史源的新发现将不仅是日后汉语学人的国际日耳曼学研究之表率，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定会嘉惠世界学林，以共同推进对于这位晦涩诗人的理解。

（责任编辑：刘玮）